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

项目完成单位：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项目主持人：张德礼 曹建玲

项目组成员：徐亚东 张书恒 刘克

周庆贺 田小枫 靳义增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通知书

张德礼、曹建玲同志：

你们申报的《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课题，已被批准列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批准号 95CWW01001，请按时完成研究任务，拿出高质量的成果。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1999年12月28日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坛怪杰”：二月河现象解读	4
1.1 二月河：黄河之子	4
1.2 十年一觉“红楼梦”	7
1.3 “帝王系列”的文化生成	11
第二章 历史阐释：百年盛世的文学言说	15
2.1 “康乾盛世”：难得的历史馈赠	15
2.2 诗家释史：想象力的张扬	19
2.3 平民化：文学言说的审美选择	22
第三章 文本的审美建构：诗与史的融合	29
3.1 诗与史：历史小说的由来困惑	29
3.2 艰难的选择：诗与史的融合	32
3.3 通俗性：“帝王系列”的大众化特征	37
3.4 雅与俗：既成模式的局限与出路	41
第四章 文本意蕴：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47
4.1 史识：百年历史的文化回味	47
4.2 人物：传统文化的孕育与承传	52
4.3 名士情怀：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之一	57
4.4 历史氛围：清代文化思想的全面展示	63
第五章 文本意义：留给文坛的艺术启示	71
5.1 雅俗交融：投向读者期待视野的审美定位	71
5.2 本土文化语境：历史小说的生命本色	76
5.3 狂欢化：消费社会小说叙事机制的激活	84

引 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涌现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强烈的“文化还乡”情感取向的作家群体——豫西南小盆地中的南阳作家群。二月河是其中格外耀眼独特的“这一个”，唯有他不是南阳籍人。他原籍山西昔阳县，幼年随父母来到南阳，迄今已近 50 个春秋。尽管其间有 10 年军旅生涯，但南阳早就成了他时时牵挂的家，生活已经把他铸造成一位“南阳人”。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南阳作家共有的文化追求和精神特征。但是，留给每一个作家最深刻记忆，或许成为他走上文学之路以后时时回望的童年生活，二月河不同于其他的作家：他出身军人家庭，父母都在南阳城内工作，这种生活环境又异于大多为农家子弟的“宛军”同行。所以，当南阳盆地形成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时，其他作家都从“故乡”淘金，开始“文化怀乡”的精神跋涉时，二月河则走进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清帝系列小说创作。

二月河对历史、文学有天生的爱好。中学时曾有老师讥讽他学不好数理化就没有出息，二月河至今对老师的片面批评愤愤不平。入伍 10 年，他又饱览“二十四史”，广涉哲学、文学著作，甚或历代碑文、清人笔记、野史杂闻，都进入他的阅读范围。1978 年转业回南阳，在原市委宣传部工作。适逢中国开始思想解放，丰富知识的积累发酵，促使他要寻找一个抒发的突破口。二月河先从《红楼梦》研究入手，前后写出 17 万字的红学论文。《红楼梦》与清代历史的密切关系，又把他引入清帝系列小说创作。1985 年《康熙大帝》第一卷横空出世，轰动文坛，人们对这位此前连一篇小说都未发过的南阳作家惊叹不已，誉之“文坛怪杰”。回望来路，看“怪”不怪，二月河选择历史小说创作，实为必然，因为他同样实现了自己“文化还乡”的情感追求，走进了自己一直向往的历史与文学的“精神家园”。我们不知二月河对历史的钟情，是否受到南阳这块曾有“帝乡”、“南都”之称，蕴蓄着丰富历史文化宝藏的圣地的熏染，反正小说中时时有南阳俚语方言的流露，更有评论家论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的写成也许特别是得力于南阳的自然历史文化化育的人文氛围，得力于有包藏宇宙吞并天地肯于周密谋划善于深长思考的卧龙精神的滋养。^[1]从这点上讲，二月河是南阳的，是南阳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交融而养育出来的。但他更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素养和艺术追求，其“清帝系列”小说在当代文坛上不同凡响，以其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了作家的非凡实力，创造了历史小说的新气象。成为当

代文坛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学风景线。我们的研究，试图以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对二月河历史小说作以下几方面解读：

一是解读“文坛怪杰”二月河，探索二月河精神历程的文化育成。二月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一走上文坛，就向重大历史题材冲击，选择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百年盛世”，塑造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典型及围绕他们的上上下下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形象，而且发奋 10 年，一气呵成。这么巨大工程，这么恢弘的气势，作家没有丰厚的知识积累，没有非凡的艺术魄力和才情，是担当不起的。我们不能不对二月河这一“文坛怪杰”刮目相看，不能不承认其“清帝系列”在当代文坛，尤其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的特殊价值，称赞他不同凡响的大手笔。由此，也不由使人想到，敢于问鼎清帝，创作如此鸿篇巨制的二月河，是否尽得帝乡南阳汉文化之精义，胸中也涌动着中兴汉室的一代明君——光武刘秀的帝王之气，满蕴着古人龙、一代名相诸葛亮之文韬武略和治国精神？

二是解读诗家视野中的历史，阐述二月河对清代“百年盛世”进行文学言说的机智与才识。从而见出二月河继承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整合与创新能力，寻绎他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的开拓之路。

三是解读二月河历史小说文本的审美建构，阐释其历史小说创作冲破传统的“诗与史”两难选择的困境，走向两者较为完美融合统一的契合点——雅俗共赏的审美机制，进而见出其小说在处理历史事实与艺术想象，现实理性与审美虚构等艺术创造方面的独特价值。

四是文本意蕴阐释，揭示二月河历史小说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二月河历史小说文化阐释的重点。这一部分，旨在探讨二月河历史小说对“康乾盛世”百年历史进行文化透视的诗家史识，探寻作品中性格各异的众多人物形象所包蕴的传统文化情愫。二月河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他写历史小说不是“戏说”，也不做演义，而要“为古人画像，让今人照镜子”。他自言：“我只是真实地描绘当时的社会”，“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很残忍的东西，封建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很虚伪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使他们能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各个阶层看了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那对社会就是一种贡献。我的用心是善良的。”^[2]所以，他反复表示：自己的创作要对广大读者负责！在商潮滚滚的现实条件下，二月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确实令人敬佩。

五是阐释文本提供的艺术参照价值，论述二月河历史小说之于当代文坛，尤其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审美品格的确立适应了读者期待视野。历史小说的创作，时时困扰作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因为，读者接受的期待视野尽管不一，但对历史小说“历史”意味的理解与感悟却是共有的期待。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能赢得广大的读者，能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是有力的证明。为了达到这种统一，作家从文学的审美本性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时代精神观照历史，在不违背大的历史事实的原则下，以人物性格的刻画为中心，着力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精神追求，由此决定生活细节的取舍与虚构，人物关系的建立和转换，故事情节的构思与安排。所以，读二月河的小说，不仅可以了解到清王朝“百年盛世”的历史变迁和世态人情，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更能认识以三个帝王为代表的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从而获得审美的满足。二是本土性文化意蕴的寄寓之于历史小说叙事语境的启示。二月河小说的本土性文化特色是在其地域文化个性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共性的有机融合中显现出来的。三是狂欢化叙事之于历史小说通俗化写作的特殊意义。总之，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为历史小说创作找到了一条新思路，提供了一种新范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被更多的人看重。

当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也存在着瑕不掩瑜的缺陷。某些情节、场面、细节描绘尚须提炼，个别地方语言显得粗俗，三个帝王越写越长，这也未必是艺术匠心独运的表征。凡此种种，我们也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给予评述，以期对二月河及其历史小说创作做出较全面的阐释。

注释：

[1]孙荪：《故乡的诱惑》，《莽原》1995年第4期。

[2]白万献、张书恒：《南阳当代作家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一章 “文坛怪杰”：二月河现象解读

大凡成功的作家，都是从最初的短篇小说或散文、诗歌起步的，但二月河却不同。他一步入文坛，就把自己的名字交给了长篇巨制《康熙大帝》，而此前他连“豆腐块”大的文学作品都未发表过。而当他的《雍正皇帝》横空出世，引起京华轰动时，人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在中国作协组织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上，著名文学评论家丁临一指出：“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一部五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好作品。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很慎重、很负责任地说的。感受最深的是：第一，作家对封建制度的把握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它是中国宫廷政治的百科全书，作品对封建王朝的虚伪性、残酷性，比任何一本小说都丰富很多，深刻得多，形象得多。其次是作家非凡的驾驭历史的能力。在整个谋篇布局上，在情节的安排上，可和金庸相比。在刻画人物方面吸收了《红楼梦》的精华。而在创作方式和写作方法上则继承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特点又加入了现代手法，我们只在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名著时才会有同样的感觉。”^[1]这虽是见仁见智之言，却也大致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二月河“帝王系列”的整体风貌和特点。然而，由于二月河长期以来的隐居式写作，使他和他的作品并没有在文坛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当二月河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以部十三卷的煌煌巨著“清代帝王系列”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包括评论界）用陌生、甚至怀疑的眼光注视他，一些评论家和媒体冠其以“文坛怪杰”、“文坛黑马”的称号。因此，解读二月河这一“文坛怪杰”，对二月河本人的研究和介绍，将有助于我们揭开罩在他及其“帝王系列”上的那层神秘的面纱，揭示出这位“怪杰”的本来面目。

1.1 二月河：黄河之子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农历9月29日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南李家庄，凌解放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一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光复全国的日子；此时，国共两军在山西的上党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后以阎锡山为首的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当时，任中共昔西县委委员、县武委会主任的乃父凌尔文正在县里开会，家里人来向他报喜，正在参加县委会的委员们七嘴八舌地给他取了这

个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名字：凌解放，凌解放的祖父一辈兄弟四人，一个举人，一个廪生，一个秀才。他的亲祖父凌从古虽也读过不少书，却没有取得过功名，但聪敏过人的他自恃才高，学会了看矿苗，探矿脉，自办小煤窑，所以家境相当富裕殷实。尽管如此，当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时，开明正直的凌从古毅然于 1937 年将大儿子凌尔寿送到部队参加抗战，凌尔寿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督学，1942 年牺牲在河北省武安县白草坪村。1938 年凌从古的二儿子凌尔文也参加了抗日武装。凌解放的母亲马翠兰出生在离南李家庄不远的一个叫王家庄的马氏中等人家里，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母亲在 1944 年就参加了革命。45 年时是区妇联主任，后改任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县法院院长等职。这是一位跟随部队转战南北、骑马打枪、出生入死、练就一身男人都少有的作战本领的极具个性的巾帼豪杰。凌解放曾回忆道：“她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却写得一手漂亮字，写的文章亦充满激情，很有文采，在她身上，我几乎没有发现女性的温柔；她抽烟、喝酒，她的脾气出奇的怪，动不动爱发火，爱吼，我对她极其惧怕，怕到惟命是从的地步。”^[2]

凌解放自认为是黄河的儿子。由于父母亲工作的需要，两岁时他便离开了山西，跟随辗转于黄河两岸剿匪、打游击的父母，自小对黄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 1986 年他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付梓出版时，他的眼前浮现出了那条落日映照的二月黄河。他回忆道：“二月河的笔名，其来由是，我小时候在黄河边上，三门峡、陕县那个地方有个太阳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太阳落下来，整个黄河面上，整个邱山呈现一派非常壮观的玫瑰紫色，太阳在黄河里泡着，满河都是淌动着的黄金。以后，又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景致，但从没有像这个地方那样感动过我。黄河到二月冰开，河中冰块像万马奔腾，非常壮观。二月河就特指黄河，我就曾说过，将来我死了以后，最好把我扔到黄河里去”。^[3]怀着对黄河的挚爱与崇敬，凌解放终于选择了“二月河”这个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其实，在这个优美名字的背后，还蕴含着凌解放的一份自负与自信。在他看来，有《夺宫》这么一个新的开端，自己的创作态势一定会像冰凌开化了的二月黄河那样（二月河本姓凌，凌解放即此谓也）波涛滚滚，奔腾不息。它预示了二月河一个创作汛期的到来。

然而，正如天才并不都是天生的那样，童年时代的二月河并没能显出有特别的天赋，而是一个被老师骂作“饭桶”的坏学生。如他所言：“我七岁上学，转学十余次，留级两三回，经数十位贤明老师，功课一直中下，以为‘不堪造就’者有之，以为‘朽

木不可雕者’有之，以为‘废物’者亦不乏其人”。^[4]在长年漂泊无定的迁徙生活中，二月河跟随父母先后辗转于河南的陕州、栾川、洛阳、邓县、南阳等地。由于父母工作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关心他，他便养成了任性、贪玩的个性。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下课了也不复习功课，逃学倒成了他的日常课，作业写得潦潦草草，丢三落四，字写得缺胳膊少腿，一点不按汉字的书写规范去写。时至今日他的手稿还是让编辑、校对和印刷厂的同志头痛。老师恨铁不成钢，就训斥他骂他，说他是“饭桶”、“废物”、“垃圾”。只有这时他才收敛起那天不管、地不收的性格，低着头任老师训骂。事过之后，他就又恢复了他那种“笑骂任人笑骂，我行我素而臣”的常态。当然，在二月河的成长过程中，对他的性格形成影响最大的还属他的母亲马翠兰。作为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马翠兰是那种“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来了’众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肃穆；串成蚱蜢串儿似的犯人们在太阳下晒暖，见她过来，会抖动着腿阿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的令人尊敬又骇怕的公安战士；^[5]作为母亲，她却不是那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那种“为因我逃学不肯受调教，为因我诸门功课成绩‘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失声嚎叫，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的做事认真、性格刚烈的母亲。^[6]所以，每当有记者来访，问起二月河何以有这么大的成就，这种坚强而执著的毅力是从哪里来的，笑而答曰“母亲给的”。

1958年，具有了坚毅性格和独立生活能力的二月河在他十三岁时随父母来到人杰地灵、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古城南阳落户。有一段时间，他独自留在离南阳百里之外的邓县，住在同学家里，有时暑假也不回家，和同学一块到河里摸鱼、抓螃蟹，到田野里捉屎壳螂烧了吃。那是他的天性最放纵的一段时光。但自高中时开始，二月河逐渐显示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王子与贫儿》、《汤姆·索亚历险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优秀的中外古典名著占据了他课余的大部分时间，他甚至幻想着等高中毕业，能到大学的中文系里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然而，当1966年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上大学的梦彻底破灭了。这时，丧母不久的二月河，家也被连抄了三次，家中藏书被洗劫一空。他被迫星夜逃到河北邯郸姑姑家躲藏。和他十分要好的一位高中女同学也没有逃过这场劫难，等从姑姑家回来，这位女同学全家都搬走了，这对于刚刚萌发恋情的二月河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遭受了国变、家变和情变三重打击之后，1968年，23岁的二月河穿上军装走入了军营，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年轻的二月河经历了人生最艰苦的磨难，他所在部队属总后工程兵，挖煤、盖房子、修公路、筑河堤、打坑道，基本上从事的是很艰苦的地下作业，而且，他在坑道干活漏水被淹过，在井下掏煤被电击过，房屋倒塌被压住过，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过，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还出过车祸……艰苦的劳动使他落下了气管炎、风湿病。终于，他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发挥，他在新闻报道和宣传方面的才能很快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由战士而宣传干事、副指导员。然而从内心来讲，他最愿意干的还是想读书、做学问、写文章，他慨叹自己“路走对了，门选错了”，精神上很痛苦。1978年，从军十年的二月河转业到原南阳市委宣传部，做了一名宣传干事。

多少年后，当被问起自己何以“张空拳于战文场”，成为“文坛怪杰”的秘笈时，二月河说：“我原来并没有搞创作当作家的打算，但我这个人喜欢读书，实际上我的自学生涯是从部队开始的，读书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高度的精神饥饿。”^[7]由于做宣传工作相当出色，二月河不久便被调到了团宣传股，这里有个图书室，给他提供了很多读书的机会。1969年部队从太原调拨到辽宁凌源县，领导决定将图书室的书堆到篮球场全部烧掉，担任烧书任务的二月河就从书堆中拣了《辞海》、《辞源》、《莱蒙托夫诗集》、《宋元学案》之类的书打到背包里。在那个缺乏女性温柔的绿色军营里，这些书籍便成了他生活的良师益友，精神的栖息场所与他相伴了十年。他说：“我在部队的十年基本上把《二十四史》读完了，其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续唐书》，还有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包括被学术界称作‘黑老虎’的历代碑文。可以说我掌握了相当多的原始资料，这些积累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是那个时代造成的。”^[8]因此，当谈及“文坛怪杰”的由来时，他说：“我在四十岁以前连个豆腐块、火柴盒大的小说也没有发过，所以人们对我的出现都感到突然，但我自己知道这有它的必然性，我即便不会在这方面冒尖，也会在其他方面冒尖的。”^[9]

1.2 十年一觉“红楼梦”

1981年，时任我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收到一封来自河南南阳，署名凌解放的来信，和一篇名为《史湘云是“禄

蠹”吗？》的红学研究论文，这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二月河在多次投稿给《红楼梦学刊》不中，杳无音信的情况下的愤怒之举。信中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就请回信，我再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十天以后，二月河收到了冯其庸先生的回信，写道：“稿子已看过，写得很好，我已经把它推荐给《红楼梦学刊》发表”。

应该注意到的是，二月河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红楼梦》研究与他日后从事“帝王系列”的创作是有着渊源关系的。二月河在台湾版《〈康熙大帝〉自序》中也说：“我对清史的兴趣是从研究《红楼梦》这部奇书开始的。此前我一直悠游于两汉及两晋史中。1980年仅仅涉猎了《清史稿》，草草过目，自然十分皮毛。但我的‘红癖’和凡事拼命追根溯源的秉性，终于将我推入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以至于在这海中迷失本来面目，几乎完全放弃了原来的目标。”^[10]而且，选择《红楼梦》研究也是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第一步。他说：“我最终把《红楼梦学刊》作为自己的突破口，我自己感到以前在红学方面有些基础，从这里突破很有可能成功。我要想取得文人资格，就一定要进入这个被学术界称为‘贵族阶层’的团体中去”。^[11]1982年经冯其庸先生推荐，二月河作为正式会员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研究《红楼梦》不能不涉及清史，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是康熙的侍卫（即《康熙大帝》中的魏东亭）。在研讨过程中有人提出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杰出的皇帝，怎么至今没有见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出来。这些提示对于处处留心的二月河是大有启示的，他认识到这确实是个重大的题材，值得一干。于是回家以后他就开始准备，把《清史稿》中有关康熙的资料素材，以及以前积累的《清人笔记小说大观》等高密度地集中起来，经过两年的资料准备，很快，他的17万字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的前十回手稿就出来了。

应当说，作为一个业余红学研究者，二月河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先后写出了17万字的红学评论，17万字的读书心得《扫红集》。1984年5月，已与二月河成为忘年之交的冯其庸先生到四川考察途经洛阳，顺道专程到南阳看望二月河。二月河将自己17万字的手稿拿来请冯先生指教，冯先生说你的红学论文我已领教过了，《扫红集》怕不会超过邓拓，还是看小说吧。他在看完了手稿之后说，写得非常精彩。并嘱咐二月河集中力量写小说，其他什么也不要搞了。

如所周知，多年来对《红楼梦》这部名著的研究可谓流派纷呈，出现了诸如索隐、

影射、评点、阶级分析等多种研究流派。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书目的。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12]这里所谓的“经学家”、“道学家”、“才子”、“流言家”等都脱离《红楼梦》实际，按各自从事的社会科学“尺度”和“标准”来机械地评论《红楼梦》，结论自然是荒谬的，却也大致说出了《红楼梦》的多种解读方法。从二月河 17 万字的红学论著看，这些文章时时处处闪烁着文章作者的机敏与智慧，和他良好的艺术感悟力，以及作者不为成见所囿，试图寻找新的突破的“野路子”特征。

《凤凰巢和凤还巢》^[13]是作者为《红楼梦》的重要人物王熙凤鸣不平的一篇长文。文章作者选取典型事例进行详细分析，指出王熙凤本人也是那个封建社会大家庭的受害者，她所走的道路也是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中广大妇女注定要走的道路。关于她在因邂逅贾瑞，导致贾瑞之死，二月河认为“我是有夫之妇，不能也不爱你”；关于尤二姐之死，二月河认为“王熙凤的‘错误’思想根源仅仅是不愿意在自己夫妻生活中再掺进个第三者而已”；关于“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二月河认为金哥“夫妻”的悲剧恰是他们“为一条没有爱情的婚约而做出的愚蠢行为”。在总结长期以来对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产生“误读”的原因时作者指出，批评者所选用的“命意”和标准恰恰是封建社会的男权价值标准，这对王熙凤是不公平的。至于宝黛的爱情悲剧，二月河认为“掉包计”是不存在的。续作者高鹗只看到曹雪芹的“假意”，而对字里行间的“真情”却不甚了了。所以在最主要人物的结局和最重大事件的连续上，他基本上全部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浓厚的追求个性解放色彩的爱情不见了。成了黛玉为爱殉情的‘相思病’，‘命运扼杀爱’，变成了‘阴谋毁灭爱情’”。同样能体现二月河不拘成见的论文还有《史湘云是“禄蠹”吗？》。^[14]在一般看来，史湘云是始终与宝钗站在一边的“禄蠹”，而与“目无下尘”的林黛玉格格不入。证据之一是三十二回中她劝宝玉会见贾雨村时说：“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也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而二月河通过对史湘云的性格分析指出，“史湘云性格豪爽，气量阔大，胸无城府，没有半点虚伪，她的思想和作风也与封建女子的正统规范相去甚远”，而且，她在性格、境遇、思想上与薛宝钗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她是《红楼梦》中“一个天真无邪、没有半点道

学气的娇憨的叛逆。”

当然，与经院派红学研究相比，二月河红学研究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比较缺乏严密的逻辑起点，感性的判断超过了理性的分析，等等，但恰是这十多年不解的“红楼”情绪，使二月河对清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些知识不仅为他日后进行“帝王系列”的创作进行了资料上的准备与铺垫，而且也为他的红学研究提供了一把解疑难答疑的钥匙，如在《凤凰巢和凤还巢》一文中，二月河通过十六回中王熙凤说“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儿，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一段话，指出1684年康熙宣布废止“禁海令”，曾下令在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设立对外贸易港口所谓“粤闽滇浙”必是“粤闽赣浙”之误，进而推测出王熙凤的爷爷“是我国最早的外交、外贸大臣兼海关总管”，从而指出了王熙凤不读诗书、不遵妇道、不信鬼神、崇拜金钱、爱赶时髦的性格是有其合理性的，再如针对元春之死系受柳湘莲造反牵连之说（《元春之死与李纨母子之死兼议贾府的回光返照》）二月河指出，依《清律例本宗九宗丧服图》规定，柳湘莲之未婚妻尤三姐与元春构不成“九族”关系，因此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些都是文章作者依据清史资料而得出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二月河在谈及自己由红学研究转入小说创作时说：“我特别感谢冯其庸先生，贵为红坛要津，我一纸论文相投，纳我进入红学界，取得文人资格，继而又告我有写小说之才分，坚我信心，又硬跳了文坛”。^[15]当年，冯其庸在看了二月河的红学论稿后称赞道：“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写法”；“可以浮一大白，用《汉书》下酒”。^[16]这些评价不仅客观上指出了二月河红学论文的主要特点，而且也的确发现了二月河潜力所在，整体地考察二月河红学论文，这种“小说的写法”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为二月河红学论文增色不少。例如在论及元妃死因时，二月河否定了众所周知的诸如身体发福痰涌而死，或被赐帛而死等的说法，指出了元妃死于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同时也是贵妃之间争宠斗争的结果。立论奇异，想象丰富，把元妃之死演绎成了一场血腥的宫廷斗争，确有小说笔法；而二月河对《红楼梦》中一个非重要人物薛宝琴命运的推论（《流水空山有落霞——试析薛宝琴》）也使人从中看出其结构故事的能力不菲。

1.3 “帝王系列”的文化生成

在当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界似乎存在着两种经历迥然不同的作家，即所谓的“软着陆”与“硬着陆”。“软着陆”意谓出自名门，或来自经院，一步一步沿着一条铺满了鲜花的路走向成功，犹如张开降落伞缓平着陆。二月河显然不属于前者，最高学历为高中毕业，凭着艰苦不懈的努力自学成材的二月河闯入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凭借的是胆识与毅力。依靠的是“我是在高天飞机上，无任何倚仗凭藉，眼一闭心一横，就那么赤条条地跳了下去，直落硬降”^[17]的不要命精神。因而，当1986年时年四十一岁的二月河出版其处女作《康熙大帝·夺宫》之后，又以每年一本（40万字）的写作速度出现在文坛上时，人们自然会惊呼其为“文坛怪杰”，欲知二月河为何物，亦如他自己所言，“物反常即为怪。我有点像柏油马路上突然长出来的蘑菇，自必是‘怪’”。^[18]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认识二月河小说创作的这种“怪”现象，他成功的秘诀，亦即“帝王系列”的文化生成机制是什么。目前，创作历时15年，多达500余万字的“帝王系列”已告竣工，二月河正着手进行“陨雨系列”的创作，在这个系列中，作者将集中反映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风雨飘摇的整体时代风貌，并将着重表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位清代中兴名臣的政治生涯。这个或可被称作“将相系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对于已著作等身的二月河无疑是一个挑战，因为无论是体力和才力，还是读者方面都将会对二月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对于前述问题的探讨与总结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二月河，更为正确地估价“帝王系列”的文化价值及其意义。

如果用纯审美的眼光审视二月河“帝王系列”，其中固然充满了作者的智慧与才气，这也是二月河能赢得读者与专家好评的主要原因，他自己说：“整个《康熙大帝》第一卷擒鳌拜在《清史稿》中只有四行，要想靠这四行写书那你非得非常大的天才，”^[19]但二月河写书决不仅仅靠的是智慧和才气，其中更有他长年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与耕耘。如当年为再现康乾盛世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他白天上班，晚上则蹲在铺满资料又阴暗潮湿的斗室里查阅资料，经过二年多时间对康熙的反复考证，以及在大量的野史、清人笔记和小说中寻幽发微，钩言稽沉，感受体会风土人情、官场世态和时代风貌，二月河终于塑造出了康熙这个千古一帝的艺术形象，这靠的恐怕是功夫。二月

河也自言：“假如这世上有人曾经始终和我同路跋涉过艰难人生（唉……很遗憾，没有），他就能告诉你，我其实原来是个痴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怎样一个读书狂，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曾在凌晨一点半睡觉，告诉你我曾被管理员遗忘关扣在图书馆中而不自知，告诉你我捧书走路，踢掉了脚指甲，血流殷道而浑然不觉。假如他看见我裁开包水泥的牛皮纸装作卡片，一字一句地摘录那些‘劈柴’纹理，他就只能说‘二月河不过是文坛一痴’”。^[20]这段自述无疑说出了他成功的秘诀之一，靠的是对文学的这种痴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他最初开始创作的那段日子里，写作条件非常艰苦：冬天没有取暖设备，手冻僵了，起来搓搓手，跺跺脚继续写。夏天闷热难耐，他买不起电扇，只能用一个水桶，装满凉水，将脚泡在里边，两条胳膊缠上湿毛巾，干了再放进桶里浸一浸，以避暑驱虫。“头发，就在这样的煎熬下大片大片地脱落下来。以至于 1986 年出书，电视台采访，难煞了摄影师，因为脑袋正中一片白，像地球仪上的澳大利亚，周围布满小岛，千奇百怪异样风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个丑八怪。”^[21]

我们或许能从二月河这些回忆性的自述中看到 he 当年刻苦读书、奋力写作的面影。其实，作为黄河的儿子，虽然二月河的少年时代是在黄河两岸的颠簸流浪中度过的，而且又在绿色军营中度过了十年艰苦的读书生涯，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样，南阳这块有着悠久历史文明和浓厚文化氛围的土地，与他的“帝王系列”的滋长和最终形成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众所周知，南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从发掘的南召猿人前臼齿化石看，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早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用简陋的石器，创造了南阳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南阳境内已发现了上百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遗址。夏朝时南阳属豫州；商朝时，武丁“奋伐荆楚”，曾以南阳为前哨阵地。南阳在西周时称为“申吕之国”。据考古认定，楚国的第一个国都古丹阳，就在今南阳西部的淅川县下寺附近，这里应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屈原流放汉北之处也当在此。他的著名诗篇《国殇》描写的就是楚丹阳之战的壮烈场面。秦明正三十五年（前 227 年）初设南阳郡，始有“南阳”之名。西汉时，南阳已成“天下名都”，东汉时，南阳县极尽繁华，光武帝刘秀生于斯、后起于斯，辅助他打下江山的二十八宿文臣武将又多为南阳人，因而南阳又得“南都”、“帝乡”之美称，其政治经济地位堪与京都洛阳平分秋色，大文学家、科学家，南阳人张衡在《南都赋》中称其“商遍天下”，“富冠海内”。

南阳自古文风很盛，名人辈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奚、范蠡，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医圣”张仲景，一代智圣诸葛亮等。南阳的文化自东汉起开始了它的繁盛时期，出现了刘苍、朱穆等 40 余位政治家兼文学家，他们共同参与编写了 140 余卷的文学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东观汉记》。南北朝时，南阳人范晔博采众长，完成了集史学、文学于一体的《后汉书》，他的诗歌理论对后来永明诗体和永明声韵理论的产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梁时南阳新野人庾信诗名甚高，被称徐庾体的创始人，其《哀江南赋》思乡情切，悲慨苍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甫称赞“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后人评价他“集六朝之大成，导初唐之先河”。而在唐代繁荣的诗苑文苑中，南阳诗人张巡、岑参、韩翃、张继、樊绍述、张祜等饮誉文坛，特别是岑参的边塞诗作，以其构思奇崛、意境壮阔、风格高峻而独步文坛，成为盛唐时期的代表性诗人，陆游称他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南阳古代的历史、文化名人，目的是想从另一个方面来论证二月河“帝王系列”生成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文化的血脉与传统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的。这一特征同样也可以从二十世纪南阳作家的大量出现中得到印证。从 20 年代享誉文坛的冯沅君（淦女士），到 30 年代即已初露锋芒的姚雪垠，40 年代的李季，南阳文风昌盛的传统就没有中断过。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南阳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同宾等为主的“南阳作家群”，受到各界的广泛注目，这里还且不说像宗璞、症弦、张一弓、柳建伟（电视剧《突出重围》的编剧与小说原作者）等一大批原籍为南阳的知名作家。由此不难看出，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定程度上，它得了南阳这块神奇土地的培养，和这里浓厚文化氛围的雨露滋润。

当然，对二月河“帝王系列”文化生成机制的探讨决不能超越它的现实规定性。换言之，二月河“帝王系列”的产生最终离不开二月河个人的努力，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外部环境只是产生这一行为的必要条件，而“帝王系列”则是这些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综合的必然结果。其实，就目前而言，对二月河“帝王系列”生成机制的探讨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面对这三部十三卷足可传世的煌煌巨著，我们如何从中解读出它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总结出它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且迫在眉睫。

注释：

[1]丁临一：引自1998年10月13日（香港）《文汇报》，宋寅：《二月河〈月昏五鼓〉预告帝制终结》

[2]《家庭》，1999年第5期。

[3]二月河：《我是太阳渡的孩子》，《河南经济日报》1995年3月4日

[4]二月河：《无题寄语》载《二月河作品选集》第12页，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

[5][6][7]二月河：《母亲墓道前的沉吟》，载《二月河作品自选集》第5页，第3页，第3页

[8][10][11][19]白万献、张书恒：《二月河创作座谈会纪实》载《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

[15][17][18][20]二月河：《〈康熙大帝〉自序》载《二月河作品自选集》第219页、第221页、第221页、第221页

[12]鲁迅：《“绛洞花主”小引》

[13]二月河：《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

[14]二月河：《红楼梦学刊》载1981年第4期

[16]冯其庸：载《匣剑帷灯——二月河作品选》封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

[21]二月河：《〈康熙大帝〉与头发脱落》载《二月河作品自选集》第15页